

斗争民主党是意识形态强大的政党

编译:崔一生

斗争民主党(简写PDI-P)是意识形态强大的政党。它将在2024年大选,再次接受考验。这个党和它推举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之间的选举政治共栖关系,是政治契机,同时也是挑战。

它在党章/细则,称斗争民主党是以班查西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政党,正如在1945年宪法序言所叙述的那样,是1945年6月1日诞生的宪法精神和灵魂。另一方面,党的特征是民族主义,亲向人民和社会公正。党的这个意识形态称为“马亨主义”(Marhaenisme),被认同为保护小民(wong cilik)和必须在每个建设措施体现人民的主权。

斗争民主党在大选继续展现获取最多选票能力的趋势。在改革时期五次大选中的三次大选,斗争民主党巩固了它作为胜选政党的地位。

斗争民主党达到这个地位的能力,离不开它在新秩序时期——当时称为印尼民主党(PDI)的“反抗”精神,这个党处在与统治集团对立的位置。在那个时代,印尼民主党的获票率一直处在最低的地位。当进入改革时期,1999年大选斗争民主党转变成获胜的第一大政党。

在1999年大选,斗争民主党取得33.7%选票居冠,在国会取得153个席位或国会总席位的33.1%。另一方面,新秩序时代的执政党——从业集团(Golkar)获票22.4%为第二大,国会有120个席位。

斗争民主党除了处在与新秩序政权对立地位,更是有意识形态的政党,身为独立宣言人苏加诺女儿,美卡蒂蒂领导的斗争民主党也拥有象征性的强大资本。这个意识形态和象征性资本是斗争民主党在改革初期第一次大选获得大胜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接着的二次大选,斗争民主党却没有获胜。2004年大选,它的获票率滑落成18.5%。处在获票21.6%的从业阶层党之后。在2009年大选,斗争民主党获票再下跌成14%,处在民主党(20.4%)和从业阶层党(14.15%)之后的第三位。

2004年大选和2009年大选后,斗争民主党重新成为反对党,就像新秩序时代的地位那样。斗争民主党成为第6任总统尤多约诺政府的在野党。在2014年大选,斗争民主党重新取得胜利。一方面,民主党不再有能力维持在尤多约诺总统执政时期的选票优势。另一方面,在斗争民主党内部出现能够像磁铁吸引全国民众的新人物,即佐科·维多多(佐科维)。

自从这位梭罗市长出现直到2012年成功当选雅加达省长的佐科维,对准备面临大选的斗争民主党,是一股清风。

引起关注的是作为斗争民主党总主席美卡蒂蒂和在2014年总统大选当总统候选人的佐科维之间建立的政治共栖。作为领导人,美卡蒂蒂仍然有能力掌握直到草根阶层的党政治方向。而佐科维

是吸引公众包括推举他的政党的视线。

大选结果,斗争民主党在2014年大选重新获得竞选胜利。这个党的获票率18.9%,超过了处在第二位获票率有14.7%的从业阶层党和处在第三位获票率有11.8%的大印尼运动党。2019年大选再次取得最多选票,以19.33%获票率居冠,大印尼运动党有12.57%和从业阶层党有12.31%。

从意识形态来看,这三个大党同样趋向是民族主义政党。但是,比起另二个党,斗争民主党作为处在新秩序的对立地位,与它们有着不同的特征。

除了斗争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拥有的象征性资本,这个意识形态在大选必须能够体现掌握地域。从地域来说,爪哇岛仍然是斗争民主党最大的铁杆票仓。在2014年大选,斗争民主党在中爪哇的获票率最多。中爪哇的支持选票有420万张或占总获票率的18.1%。

接着,西瓜哇是提供选票第二大的区域。在这个省,斗争民主党取得410万选票或占党总选票的17.6%。

在爪哇哇斗争民主党获票350万张或占总选票的15.1%。如果这三个区域加起来,选票达到50.8%。换句话说,支持斗争民主党的总选民的半数是在中爪哇、西瓜哇和东爪哇。

这个选票的图象在2019年大选再次显现。中爪哇有570万张或占这个党总获票的21.4%,使它成为这个党最稳定的票仓。而在东爪哇,斗争民主党取得430万张或占总票数的16%,成为第二大的党。

西瓜哇取得350万选票或总票数的13%,成为第三大。这意味着,在2019年大选,斗争民主党在三个省份获票占了半数。

但是,在2014年大选西瓜哇获票下降约4.6%,这是需要特别记录的。这个记录同时也对斗争民主党加强这个区域的选举战略是一个警示。因为西瓜哇是斗争民主

党目前的竞争对手,即大印尼运动党强大的基地。在2019年大选,大印尼运动党获票总数的24.6%来自西瓜哇。

另一方面,斗争民主党推举的2014年大选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甘查尔—玛弗,趋向于能够在中爪哇和东爪哇对斗争民主党注射选票。这意思是,要重新夺取爪哇作为获票最多的区域,西瓜哇是斗争民主党选票最有挑战的地区。

看到目前出现的政治动态,2024年大选似乎将考验斗争民主党如何巩固取得在政治舞台强大的地位。同时也将证明是否在未来大选将出现斗争民主党和总统、副总统候选人之间的政治共栖。

但是,似乎有更深层次的事将受到考验,即斗争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象征性资本。在局限于赢与败考量的政治实用主义,政治上理想主义方面应该还是斗争民主党所要高举的。

(取自罗盘报研究室)

椰風墨雨

普选会“调整”候选人辩论模式

本报评论员:余凡

自从11月28日起,2024年总统大选的宣传造势正式启动后,三组候选人及其团队奇招迭出、拉拢民心、攻防兼备。但民众更期待的,是三组候选搭档的现场公开辩论会。

《共和国》(REPUBLICA.CO)于12月1日报道,印尼普选委员会(KPU)已经决定,2024年总统大选将举行5次辩论会,正副总统候选人一起参加。与2019年安排正副总统候选人分开单独辩论不同。普选委员会主席哈辛姆(Hasyim Asy'ari)在其办公室对记者说明:“五场辩论会,正副总统候选人全体到场,不过,讲话的部分不同。当总统辩论会时,总统候选人说话的分量较多。而当副总统辩论时,则由副总统候选人主导辩论的话题。”

作为对比,2019年的5场辩论会,正副总统候选人共同参与的有两场,由总统候选人单独参与另两场辩论会,特地留下一场辩论会,是指定由副总统候选人独自面对的。

《点滴网》(Detik.Com)于12月2日称,普选委员会技术组长依达汗姆(Idham Holic)向媒体披露竞选辩论会的安排:“总统候选人3次,副总统候选人2次。”每次辩论会正副总统候选人都到场,但3次由总统候选人主导,2次则由副总统候选人当主角。

依达汗姆表示相关的调整并不违反宪法规则,相信诸位候选人搭档能够接受这样的微调。“从任何角度看,辩论会的重新编排没有违反公众普选的相关宪法。”“相信各组候选人了解民众想听到治国愿景和使命的蓝图,而辩论会是候选人说明愿景的最佳平台。”

普选委员会为正副总统候选人所设置的辩论时间和主题如下:首场于12月12日,辩题是法律、人权、政府、反贪污及强化民主。第二场于12月22日,关于国防、安全、地缘政治及国际关系的议题。第三场于明年1月7日举行,主题为经济、社会福利、商贸投资、粮食、电子税务、财政收入、国家及地方收支预算、基础设施等重要的民生环节。

第四场辩论于明年1月21日,分析能源、人力资源、国内媒体、碳排放、环保、农

地、土著文化。最后一次则于2月4日,辩题是信息技术、提升公共服务、假信息、不宽容、国民教育、保健防疫、劳工法则等。考验诸位正副总统候选人的知识、眼界和能力。

《时代网》(TEMPO.CO)于12月2日消息,普选委员会公布2024年正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的安排与2019年稍有不同,引发了各界的不同反应和议论,甚至猜测偏袒某候选人。

为了应对相关论述,普选委员会主席哈辛姆解释,安排正副总统候选人同时登场,能向民众展示他们之间的团结和默契,是2019年规则的提升。“让公众见证他们在辩论会的表现而更为肯定对他们的支持。”当然,这还得看候选人对相关话题的掌控和表述。

普选委员会专员(Komis-ioner)依达汗姆表明,根据2023年第15号普选法50条第1款,2024年正副总统候选人仍然进行5次公开辩论会。总统候选人辩论3场,而副总统候选人2场辩论。但所有正副总统候选人都参与5场辩论会,只是讲话主角有所不同。

施达拉(Setara)研究所执行董事李里(Halili Hasan)分析,普选委员会改变辩论程序,取消专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的设定方案,而引发民众合理的质疑。“普选委员会益发加深公众的疑虑,值得我们担忧,普选委员会向来自外部政治势力的越权干涉低头。”

《安塔拉新闻》(ANTARA)于2日报道,第3组正副总统候选人的胜选团(TPN)对KPU公布2024年正副

总统候选人辩论程序表示不满。该胜选团法律副团长(Todung Mulya Lubis)在线上的公开贴文写道:“坦白说,我们对普选会主席的通告决定感到懊恼。”

多东认为,根据2017年第7号宪法第277条有关普选的规定,以及2023年第15号普选法规(PKPU)关于竞选宣传的条文,竞选辩论会必须分两个阶段,即总统候选人3次,副总统候选人2次。如今让正副总统候选人同台辩论,显然是普选委员会在“耍花招”。

《罗盘网》(KOMPAS.com)于3日称,第2组副总统候选人吉布兰(Gibran Rakabuming)在雅加达拉哇沙利(Rawasari)市场回应记者提问时说,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上有总统候选人在场,对他并不有利。“对我没好处,对任何人也没有好处,完全一样。”

吉布兰坦承若照旧实行2019年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模式,没有总统候选人陪伴的规定也没有问题,“完全一样,有没有人陪着都一样。”他也透露已做好这次辩论的准备。

普选委员会主席哈辛姆于周四向记者解说,辩论程序的“调整”是为了让广大选民能目睹在辩论会上的哪一组候选人更体现出合作的“团队精神”。专员依达汗姆澄清:“我们必须牢记,所谓正副总统候选人是‘两位一体’(Dwitunggal)参选。”希望群众能接受。

诚然,理想的领导人是心怀国家、为民谋利的仁者;是千锤百炼、勇辟荆途的智者;是守正不阿、勤政廉洁的德者。绝不靠巨幅海报,不靠响亮口号,不靠普选会的“调整”!

基辛格走了,他给台湾问题留下了什么?



基辛格秘密访华抵达南苑机场

日月谭天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许多网友一定和谭主一样记得,就在今年七月,已经度过100岁生日的基辛格不顾年事已高、路途奔波,在中美关系处于建交后最低谷之际,进行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访华之旅。这位曾100多次访问中国的美国前外交官、“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见时明确指出,应该遵守“上海公报”确定的原则,要理解一个中国原则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两个星期前,中美元首会晤在美国加州旧金山举行。美国领导人再次重申包括“不支持‘台湾独立’”在内的“四不一无意”承诺,明确表示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世界舆论都期待美方将表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正轨,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将“旧金山愿景”变为实景。

正如50多年前那次轰动世界的秘密访华一样,基辛格再一次经历了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或许,我们暂时无从得知他这一次扮演的确切角色,也没有机会再听他亲口述说。但历史总会铭记,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方友华人士,对塑形和坚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的贡献。

斯人已逝。基辛格给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留下的,值得我们一再总结分析。

基辛格参与塑形美国一个中国政策

谭主注意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各家媒体的报道中,都突出回顾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1971年7月9

基辛格所代表的理性声音正在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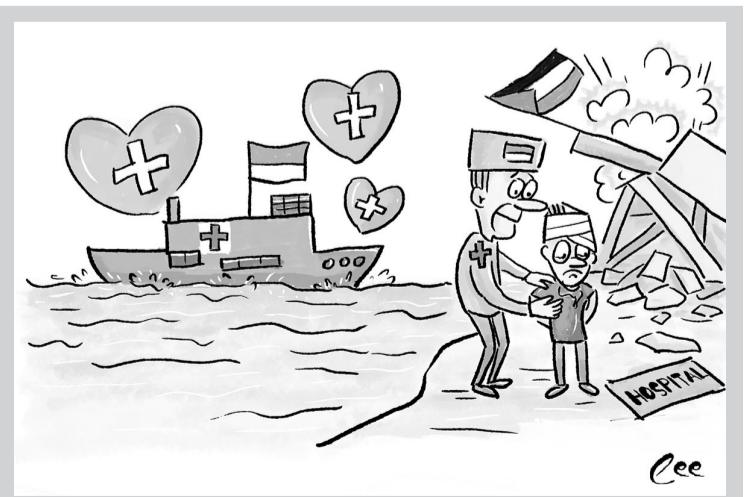
基辛格不止一次强调,美中合作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孙成昊在接受谭主采访时表示,这体现出基辛格的一个突出重要性,即他代表了美国国内更有远见、更加理性的对华声音。

孙成昊说,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国内逐渐浮现出反思对华政策的声浪,认为仅仅用战略竞争去定义中美关系并不有助于实现美国自身利益。四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莫里斯·格林伯格发表致中美领导人的公开信,联署人包括22名美前政府高官和知名企业家,呼吁两国开展对话、管控分歧,修复和稳定中美关系。

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前后,香港《亚洲周刊》观察到,美国智库对台湾问题的风向发生了转变。美国智库代表人物,斯坦福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梅慧琳十月中旬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相较于台海战争,两岸之间谋求和平统一更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她表示,“阻止两岸统一不是华盛顿的责任所在”,呼吁美国领导人“重申不支持‘台独’,不反对两岸和平统一”。《亚洲周刊》称这是美国智库第一次作出这样的论调,展现了美国企业界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最新看法,认同两岸和平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亚洲周刊》还说,除了梅慧琳明确支持“和平统一”以外,美国的主要智库中,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呼吁更理性的对华政策,反对美国社会对华问题的“泛政治化”,追求更长期稳定的中美关系。

美国智库的新动向,让谭主想起了不久前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就台湾问题的表态:“统一是100%会发生的”。从某种程度上,这些被视作“美国最聪明的人”,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正趋向一致,值得各界重视。谭主希望,在纪念基辛格的时候,美方能进一步认识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性,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不会损害反而只会增进美国在台湾乃至亚太的利益,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漫点南洋

印尼医院船救助加沙儿童 Lee
投稿邮箱: editor@guojiribao.com